

以现代舞向东方古老文明深处探求

►10版·文艺百家

藏地新浪潮的类型化探索

►11版·影视

寻找老建筑里的旧书局

►12版·建筑可阅读

新业态·新文艺

用剧本娱乐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张朝霞

在演艺市场上,艺术院团等生产主体潜心创作,在剧场和演艺新空间中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而与此同时,Z世代消费文化群体的快速崛起,又对现场性文娱产品的供给提出了新的需求。其中,年轻一代青睐的“剧本杀”等新业态,成为广受关注的新型故事业态。

这种参与性、沉浸式、互动性很强的新业态,源于2013年由桌游爱好者自英国引进的真人角色扮演游戏“谋杀之谜”。后来,在推理真人秀节目《明星大侦探》等综艺项目的助推下,成为广为人知的一种文化娱乐方式。目前,在供需两旺的驱动下,全国各地的剧本娱乐已经发展成为不容小觑的新型文化产业。据相关数据显示,“剧本杀”及其相关业态已经以较高的选择偏好比例,成为仅次于“看电影”和“运动健身”等线下文娱消费类型中的第三大文娱方式。

从“剧本杀”到“剧本娱乐”,是产业思维的转型

市场需求拉动资本投入,在2017年至2021年的整体上升区间内,中国剧本娱乐行业从线上品牌大量扩充到线上线下共同成长的完整产业模式,产品内容、服务模式和消费预期达到一个制高点。同时,在内容分级、市场监管和门店安全等方面,包括剧本杀在内的相关沉浸式现场娱乐产业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和反思。2022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和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安全管理的通知》,并约定了以一年为期的政策过渡调整期。这对于剧本娱乐的健康有序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场十分必要的及时雨。

在政策规范、行业自律和供需磨合的合力作用下,中国剧本娱乐行业迎来了向稳、向好的高质量发展期。据中国文化产业行业协会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监测,2023年“五一”假期,我国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整体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50%,消费人次超过400万,同比增长480%。另据美团平台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我国剧本娱乐市场规模环比增长47%。与此同时,贵阳、洛阳、重庆等地在区域文旅深度融合角度,开始尝试推出“剧本娱乐+文旅创新”的业态整合模式,并提出了“剧本娱乐之都”的建设方略,有效促进了非主流娱乐形态的大众化、产业化和公共化尝试。

无疑,这样的努力是正向的,也是

有效果的。仅从概念上讲,“剧本秀”“剧本游”“戏剧杀”“剧本研学”等替代名称的提出,成为剧本娱乐行业自律自强、谋求蝶变升级的“集体冲动”。从成效来看,艺术思维下沉沉浸式演艺的外扩努力和产业框架下沉沉浸式旅游的内增需求,共同为今后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新型剧本娱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概念和行动的基础。

当然,从“剧本杀”到“剧本娱乐”,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转变,更是一种产业思维的转型,也是新业态成长不可逾越的底线。在走过第一个十年之后,中国剧本娱乐如果能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效作为,那么在未来十年里它或许可以成长为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同一领域内真正领先的“领头羊”。就国内消费者而言,对剧本娱乐行业的内容需求还处于上升期,不同年龄和社会阶层的“玩家”对剧本娱乐产品的需求也略有差别。这就为中国剧本娱乐产业后来居上,提供了难得的产品细分和升级迭代的契机。虽然这个“剧本”跟影视戏剧行业常规的“剧本”有差异,但其本质有相通之处,都是为了娱人、传情或达道。

事实上,一个新型文化业态从萌生到转型到“再出发”,如何稳定下来,持续下去,正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这不仅需要有适配的产品、对应的消费市场,更要有高水平的应用场景和基本的技术支撑。因此,中国剧本娱乐必须把握机遇、转型升级,从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小众娱乐,发展成为服务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理性娱乐产业。

把研究剧本的文化定位放在首位

对于剧本娱乐的从业者而言,可能需要重新考虑“剧本”问题。“剧本”不仅是专业型舞台剧产业的生命线,更是剧本娱乐产业的产品能量之源。基于此,剧本娱乐就不应该是单纯的小众互动娱乐或者浅尝辄止的旅游产业分支业态,它应该回到戏剧的娱人本质。例如,在这种新业态的商业逻辑上,要通盘考虑其文化逻辑和内在的精神价值,用剧本娱乐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换言之,剧本娱乐的利益相关者首先应该研究“剧本”的文化定位问题,即如何通过文化娱乐的方式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参与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润物细无声”的价值传递。

所幸,剧本娱乐引进中国之后,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在地化转型,“家国本”“情感本”“怀旧本”等中国特色剧本娱乐产品类型的研发与应用,为后续

产品的文化升级奠定了基础。在剧本娱乐行业新媒体企业“小黑探”不久前发布的一期TOP10周排行榜中,抗美援朝题材的《春风替我遇见过你》等剧本娱乐项目榜上有名。这个项目在“谜圈评分”榜单上也是获得了总分8.6的美誉度,其中剧情8.1分,沉浸8.3分,情感8.3分。从供需两个方面来看,这类剧本娱乐产品的市场基础良好,文化定位稳定,值得鼓励与推广。未来,从业者应进一步本土化,在硬核本之外,依托家国本、情感本等软性故事需求,讲好基于文旅创新和社群融合的在地化“中国故事”。

们应该真正将剧本娱乐视为不同群体社交和娱乐的一个文化工作方式。在实践中,可以在现有大中型剧本娱乐企业找出一批带头性的剧本企业,以政策扶持、人才培养,甚或资金投入等方式,鼓励其不断开发新产品、研究新群体、打造新市场,并确保其商业运营等也在合规基础上走向专业化。有了这样的外部发展环境,相信多数剧本娱乐企业应该会走向主动创新的实践路径。

此外,专业剧场艺术的外展型介入也是必不可少的助力之一。相对专业的演艺人才“跨界从业”,会在具体项目中直接对剧本本身的提升、新型剧本娱乐方式的研发产生正面影响。一方面,艺术教育领域的一些“破圈”探索,也客观上强化了剧本娱乐DM的艺术管理能力和剧本娱乐NPC的戏剧表演控场能力。另一方面,在剧本娱乐与剧场戏剧行业的外展交叉领域,两类产业的共生也产生了积极的成果。谜圈自媒体从业者盛赞的“南有《切西娅》、北有《赵赶鹅》”,描述的就是这类诞生于业态交叉地带的“叫好又叫座”的“沉浸式剧本娱乐产品”或称“剧本娱乐式沉浸戏剧”。

好作品往往诞生于业态交叉地带

讲好故事,是所有“本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要素。这就是剧本娱乐业进入“中国时代”的历史契机,也是新型“本子产业”的发展规律。如果从业者能够真正尊重这一规律,主动投入更多头部研发能力,其后续辐射能量将是值得期待的事情。顺着这样的轨迹,在内容研发、头部运营上投入更多专业性力量,十年后的剧本娱乐业或许可以真正进入黄金发展时代。

当然,这里的“专业性”并不是狭隘的艺术戏剧概念上的专业性,而是指从业者对于本行业的敬畏之情。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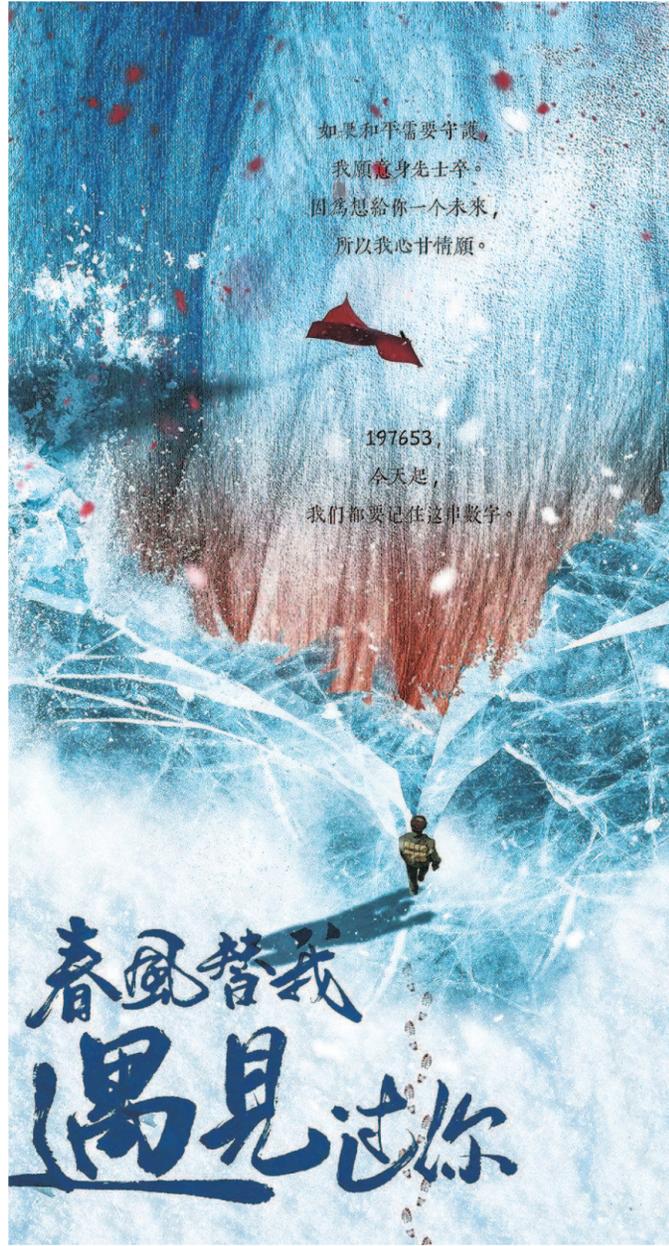
们应该真正将剧本娱乐视为不同群体社交和娱乐的一个文化工作方式。在实践中,可以在现有大中型剧本娱乐企业找出一批带头性的剧本企业,以政策扶持、人才培养,甚或资金投入等方式,鼓励其不断开发新产品、研究新群体、打造新市场,并确保其商业运营等也在合规基础上走向专业化。有了这样的外部发展环境,相信多数剧本娱乐企业应该会走向主动创新的实践路径。

此外,专业剧场艺术的外展型介入也是必不可少的助力之一。相对专业的演艺人才“跨界从业”,会在具体项目中直接对剧本本身的提升、新型剧本娱乐方式的研发产生正面影响。一方面,艺术教育领域的一些“破圈”探索,也客观上强化了剧本娱乐DM的艺术管理能力和剧本娱乐NPC的戏剧表演控场能力。另一方面,在剧本娱乐与剧场戏剧行业的外展交叉领域,两类产业的共生也产生了积极的成果。谜圈自媒体从业者盛赞的“南有《切西娅》、北有《赵赶鹅》”,描述的就是这类诞生于业态交叉地带的“叫好又叫座”的“沉浸式剧本娱乐产品”或称“剧本娱乐式沉浸戏剧”。

新品的诞生只是一种可能性。但如果从业者可以很认真地把“剧本娱乐场域”当作“新舞台”,那么可能未来消费者的数量、类型及其粘附度都应该会量级增长。

简言之,以剧本娱乐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致力于内容创新,更要注重方法创新、渠道创新。在“好本子”研发的基础上,有效借助产业思维和管理方法,最大限度发挥剧本娱乐的辐射力,吸引更多青年群体关注当下,关注内心、关注家国,让他们在“剧本娱乐”中交朋友、强体验、获成长,并最终成为参与者、交互式、沉浸式中国故事的亲历者、传播者和“讲述者”。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抗美援朝题材的剧本娱乐《春风替我遇见过你》海报

妙趣横生的文献学家严绍盪

温儒敏

严绍盪先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重量级学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不断探索,严先生以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在数十年的潜心钻研中,他建立起一套科学而严谨的比较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论体系,对后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不要说大话,空头理论没有用,一定要回到历史和文献。”这是严先生对学生后辈最常提出的要求,也值得如今学术界的年轻人们自省。

——编者

私下里,我们给严绍盪教授起了个外号叫“小广播”。这其实没有贬义,在网络还不发达的时代,信息稀缺,而严老师朋友多,管道多,“小道消息”也多,我们都喜欢从他那里听到某些秘闻。严老师记性特别好,关于北大和中文系的许多掌故、轶事,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能随时绘声绘色翻出来,侃大山。十多年前,我和严老师都住蓝旗营,同一栋楼,彼此打招呼,见他总是热情地和人打招呼,说不定又有什么秘闻。我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严老师生气,若给他画一幅漫画像,就是西装领带,头发蓬松,咧着嘴,乐呵呵的。他喜乐和善的样子与诙谐幽默的话语,能瞬间把快乐传给人。

用不着预约我便敲开“跬步斋”的门,那是严绍盪先生的家。客厅凌乱,到处堆满书、杂志和卡片。我在沙发上随便坐下,他端来两杯清茶,毫无客套,故事便开讲。我建议他把北大趣闻或故人旧事写下来,也是“野史”一种,肯定畅销。他连说好好好,可是始终没动笔。我为北大出版社策划主持过一套“名家通识讲座”大型丛书(即“十五讲”系列),请了许多学界的“大咖”来参与,也想请严绍盪写一本《日本文化十五讲》。他是“日本通”,这个选题对他再合适不过,他也很高兴答应下来了,可是等了十多年,稿子还没有写完。再后来,便不了了之。

其实,严绍盪老师那时正埋头撰写他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呢,这是个庞

大而艰巨的工程,哪里还会有余兴去写我建议的那些书?

看来,快快乐乐只是严绍盪老师生活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却是非常辛苦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学问中去了,而且做的是很枯燥的学术。趣闻和喜乐,只是他那艰涩学术的调剂品罢了。

严绍盪教授的专长是目录学,主要探寻、搜罗、整理那些流传到日本的中国古书。一千多年以来,我国大量古籍传入日本,亦有一部分是战争时期被掠夺过去的,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国内已经失传的“善本”,包括一些极其珍贵的国宝级宋元刻本。严绍盪花了二十多年时间,三十多次到日本,去追踪调查这些“日藏汉籍”。这是需要扎实的古典文献专业能力的支撑的工作。严绍盪是北大也是全国首届古典文献专业的毕业生,曾问学魏建功、邓广铭等著名学者的门下,自然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调查“日藏汉籍”,先要大致了解哪些可能是“善本”,包括唐以后日本人的抄本、佚存本,现在收藏在哪里,然后顺藤摸瓜,想办法看到这些古书的“真容”。他几乎跑遍了日本藏有汉籍的图书馆、大学、寺院和某些私人藏书机构,一本一本去追寻查访。好在当时中日关系比较好,严绍盪又广交朋友,他的治学精神得到日本汉学家的理解与赞同,因而能接触到

一般读者难于一见的“善本”。

严老师的工作是寂寞、繁琐,而且旷日持久的。他从日本各个公私藏书机构的书库中借到古书,只能在限定时间里当场看完归还。要一本本翻阅,记下其书名、卷数、署名、内容、序跋、题签、款式、版本,等等。那时电脑还不普及,全靠手工劳作,逐一用卡片记录,有的还要复印拍照。因为是“善本”,很珍贵,每借回一种,都只能在工作人员监视下翻看,中间不能吃饭、喝水、休息。多么的艰难辛苦!有人说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严绍盪何止十年?他锲而不舍,一坐就是20多年!一共收集整理了一万多种相关的文本资料,约占日本汉籍“善本”百分之七八十。

在20多年访学调查的基础上,严绍盪还要再整理、加工和研究。每一种书都要有正题(版本情况和藏书处)、按语(版式、题跋、刻工、印墨等)和附录(古籍流传的相关文献)。后来,连他自己都感慨走过来确实不容易:“一个人有了明确的理念和目标之后,往往会有连自己都释然的精神去面对困难。”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严绍盪先生为何把自己住家起名为“跬步斋”了。“不积跬步何以行千里”。严老师做学问就是有这样的耐心、恒心和毅力。

2007年7月,《日藏汉籍善本书

录》终于出版,两大册,共2336页,名副其实的皇皇巨著。与此同时,严老师还出版了《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和《日本藏宋人文善本钩沉》等著作。他对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

严绍盪不但擅于“讲古”,他本身也有许多故事。这里说一个。他在日本汉学界名声大,以至明仁天皇和皇后都曾约见过他。那是1994年11月某一天。天皇问:“先生喜欢读什么书?”答:“因为研究的关系,常看《古事记》《万叶集》等。”天皇问:“这些书对我们日本人来说也是很难的,先生以为如何?”答:“正是这样。但是,因为这些书中事实上隐含着一些中国文化的因素,从这方面说,中国人有理解方便的一面。”天皇略显惭愧说:“是的,正是这样。”

这也可见严绍盪教授的善谈与情趣。我和严绍盪老师认识很早,记得在1983年,还和他一起代表季羨林、乐黛云两位教授到沈阳,祝贺辽宁比较文学学会的成立。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对比较文学有些兴趣,其实不在行。而严老师精通日本文化,已经在中日文学比较方面写过几种论作,他是以文献学为基础做比较文学的,很实在,不是空头比较文学家。记得当年去沈阳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途中聊天,我问严绍盪为何一边做文献一边做比较文学。他说文献是基础,也很想“做出去”,人文学科是可

以“融通”与“越界”的。可见他治学的路子不但精细扎实,视野也很开阔。后来,他干脆从古典文献教研室转到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在乐黛云教授退休后,就接任比较所的所长。那也顺理成章。

1999年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严绍盪老师是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合作就更加频繁。有时碰到比较棘手的事情,比如教研室彼此“争夺”职称晋升名额,等等,严绍盪老师都用他“三寸不烂之舌”,努力去协调说项,化解矛盾,老师们也都认可。严老师在文献学、比较文学方面杰出的学术成就,以及对北大中文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有口皆碑。

严绍盪老师晚年患阿尔茨海默症,被疾病折磨,于2022年8月6日过世了。一年多过去,痛定思痛,到如今我才动笔写点有关他的回忆。昨天,我把严绍盪先生当年送我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找出来看,沉甸甸的,还特地抱去称重,竟有12斤。真是巨著!打开书,扉页上赫然几个大字:“谨呈儒敏教授正 学友严绍盪敬赠 2007年5月初夏”。严绍盪先生自称“学友”,未免太过谦逊,他是我的老师呀。合上书,仿佛又在北大静园五院,在蓝旗营,见到了这位文献学家乐呵呵的妙趣横生的样子。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